

●王锦贵

20 世纪俄国目录学发展的特点与中国目录学现实思考

摘 要 20 世纪俄国目录学前期发展的特点,是十分重视书目的教育职能,注重发挥书目在阅读中的指导作用。其中期的发展特点,是重视目录学学科建设,突出理性层面的系统研究。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也应当注意发挥书目教育职能,在理论建设上要与时俱进。参考文献 7。

关键词 20 世纪 俄国目录学 发展特点 现实思考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emphasis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bibliograph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Russian experiences to develop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7 refs.

KEY WORDS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n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ons.

CLASS NUMBER G257

因为俄罗斯曾经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主体部分,所以当本文讨论她在整个 20 世纪有关问题的时候,尽管仅冠以“俄国”二字,但这里的“俄国”既指俄罗斯自身,也应视为前苏联的代称。毋庸置疑,放眼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俄国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国度。以俄国的目录学为例,不仅历史悠久,是俄国各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堪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闪闪发光的一个亮点。20 世纪的我国目录学原本就与俄国目录学关系密切,因而认真考察该国目录学的现代进程,揭示其显著的特点和规律,这对于建设当代中国目录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 20 世纪俄国目录学走过的历程看,大体可以区别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其中,前期从 20 世纪初至 50 年代中叶,中期从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后期从 80 年代初至 20 世纪末。以篇幅所限,本文首先就其前期、中期谈谈个人一孔之见。

1 20 世纪前期:高度重视书目的教育职能,突出其应用层面,注重发挥书目在阅读中的指导作用

书目除了在微观层面上具有通信、检索、评价等三种内在职能外,在宏观层面上还有三大社会职能,这就是在与图书文献相关的基本业务工作中所反映的管理职能,在科学研究及创造性活动中搜集资料、

交流信息的科学职能,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读书治学和加强思想教育诸方面的教育职能。由于社会环境、文化条件的巨大差异,三大社会职能得以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的不同。20 世纪俄国目录学前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时期,书目的管理职能、科学职能固然都曾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发挥最充分、影响最深远者,当推书目的教育职能。

高度重视书目的教育职能,特别注重书目在指导阅读中的作用,是 20 世纪俄国目录学前期极其突出的特点。

1.1 20 世纪 20 年代前俄国书目教育职能

1903 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崛起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党伊始,该党就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强调文献分类索引的社会意义。他们以公开的或地下的期刊和小册子为阵地,推出一批又一批布尔什维克书目。尤其是在列宁领导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无产阶级报纸上进行广泛宣传,系统报道了国内外党组织出版的新书。《真理报》甚至专门辟出“书目”、“新书”、“出版述评”、“工人文学书架”等栏目,及时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向社会推荐进步书刊。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他所写的许多图书评论(如《卡尔·马克思》、《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等)都是重要的书目文献,特别是 1914 年那篇关于鲁巴金著作的评论,无愧为

书目文献的经典之作。鲁巴金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目录学家,他的《书林概述》是当时影响远播的一部推荐书目。列宁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指出“任何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都必须备有鲁巴金先生的著作”^[1],但同时也对鲁巴金关于目录学不介入思想斗争的“超党派性”给予尖锐的批判。列宁认为,书目与社会生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书目与政治无关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这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书目党性原则。这个原则既属于方法论范畴,也是目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书目事业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2 20年代初——50年代中叶俄国书目教育职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俄国目录学发展的新篇章。考察俄国目录学20年代初至50年代中叶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考察这一阶段书目教育职能的突出发挥,以下三个方面是其根本原因和基础。

(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书目工作得到有力的组织保障

为了实现列宁的文化建设纲领,苏维埃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书目事业给予了一贯的特别关注。早在1920年6月30日,列宁便亲笔签发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书目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重要法令。这项法令对确立书目事业的国家性质及发展苏联整个书目事业,具有战略意义。同年8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国家“出版物登记制”,并在国家出版局下建立了俄罗斯中央图书局。该局除了负责接受呈缴本外,还对各共和国图书局进行业务辅导。为了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1935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把俄罗斯联邦国家中央图书局升格为全苏中央图书局,并改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机构与学校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1940年联共(布)中央甚至特别通过了《关于文学评论与书目》的重要决议,指示各地加强书目工作,改善报刊评论的书目专栏,进一步搞好推荐书目。从此,全苏各主要学术机构、出版机构、图书馆、图书局等部门开始注意彼此的合作,使书目活动的协调机制得到加强。

(2)努力编写各类型书目,推荐书目占突出地位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重视书目编制优良传统的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书目事业更是蓬勃发展。不仅现行国家书目、回溯性国家书目等大型国家书目都在尽量地坚持编纂,即使是专业科学辅助书目、地方文献书目、推荐书目等其他类型的书目也相当活跃,甚

至于旨在反映二次文献的“书目之书目”也得到明显的发展。当然,最活跃、最引人瞩目的始终是推荐书目。由于这种书目能在较短时间内向群众传播重要的文化知识或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较快地成为国家的积极建设者,所以在苏俄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党和政府都始终关怀着推荐书目发展。例如早在1930年就成立了推荐书目研究所,直属政治教育委员会书目部,1931年更名为书目评论研究所,1936年该所与国立列宁图书馆的图书馆学研究所合并,建立起被克鲁普斯卡娅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图书馆学与推荐书目科学研究所”。从此,这个研究所连续编纂出版了大批紧密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推荐书目。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推荐书目主要是服务于扫除文盲,那么在以后的卫国战争、经济建设等不同时期,推荐书目则担负起更为繁重的历史使命。仅以卫国战争时期的国立列宁图书馆为例,便在当时的书目季刊《伟大的卫国战争》上,发表了许多反映苏军英勇斗争及宣传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推荐书目和文献索引。苏联人民以书目文献为武器,为最终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立足文化事业发展,加强目录学专业教育

为使书目事业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重视目录学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是促进目录学快速发展的必要措施。俄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有目共睹。早在1906年的彼得堡大学和1907年的莫斯科大学中,已经出现了目录学小组。十月革命后不久,书目课程已经列为高等图书馆院校基本科目。甚至在卫国战争之前,在列宁格勒克鲁普斯卡娅政治教育学院和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已经相继建立目录学教研室。为了专业教育的深入开展,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如西蒙、沙穆林、马萨诺夫等人)都曾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著名的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1897—1970),更是长年致力于目录学研究。他1949年就在《苏联目录学》文集上发表文章,后来更是为《列宁与书目》这一专题的完成倾注了心血,为高等院校普通目录学教材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 20世纪中期:重视目录学学科建设,突出理性层面系统研究

进入中期之后,俄国目录学明显加强了理论建设。著名目录学家卡尔叔诺夫曾明确指出:“我们从现代苏联目录学的形成来看,大约由50年代末期开始的这个最新时期是尤其重要的。这一时期重要的

界标就是1959年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国家图书事业的状况及措施》的决定和1974年苏共中央《关于提高图书馆在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决定。这是苏联图书馆——图书目录事业在前进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年代。^[2]也就是说,从1959年到70年代末的大约20多年间,是俄国目录学全面地由实践到理论,由经验叙述模式到科学的理性思维的阶段,也是从此迈入了理性层面系统研究的新时代。

2.1 目录学基本理论研究

加强目录学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50年代末,苏联兴起了一场关于目录学理论问题的广泛论争。这场论争不只涉及到了目录学的专业问题,如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书目类型的划分以及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甚至还涉及到最一般性问题的挑战,如目录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录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等等。通过研究和争辩,明确了方向、任务,澄清了长期困扰学科发展的许多糊涂观念,大大推动了目录学的进步。例如关于目录学的概念,以往的理解比较狭隘,常常把“目录学”与“书目”混为一谈。经过深入研究,使“书目”的文献情报意识突显出来。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书目活动根本问题的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哲学、科学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就,奠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能够完善整个书目活动”。^[3]至于说“目录学”,尽管这个术语早已经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日常现象,尽管很长时间以来它甚至没有被一些目录学家所认可,但是,目录学的确立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纯粹地把它当作是目录科学领域中个别术语的以新代旧”,究其实质,“这正是反映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发展一方面同图书目录的复杂、图书目录活动的规模以及它的社会威望的迅速增长相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同图书目录的完整认识,同概念性质的重大变化相联系的”。^[4]

这一时期,伴随着大批优秀目录学著作的问世,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目录学家。国立莫斯科文化学院目录学教研室主任卡尔叔诺夫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在1975年出版了《目录学一般理论问题》,1977年与巴尔苏克合作出版了《苏联目录学:现状、问题与前景》,1978年出版了《普通目录学基础理论》,1979年又出版了《苏维埃书目分类问题》,成果丰富。

2.2 目录学方法研究

到了六七十年代,目录学的方法学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当今世界“研究对象变得日益复杂,揭示其掩盖实质的外壳日益困难”,同时也基于“知识的抽象因素日益增加”,所以科学知识精确性的呼声渐起,目录学的数学化要求变成成为现实^[5]。以往传统的人文科研方法(历史法、比较法等)固然还有很大市场,但是目录学界毕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重视起目录学的数学化了,并且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自从图戈夫发表了《推荐书目——系统研究的对象》一文后,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也受到目录学界普遍关注。尽管还有一些人心存疑虑,但人们对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兴趣已经大大提高。

2.3 目录学科学研究的组织

要使目录学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科学地组织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强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及相关部门间的联系与协调,是相当重要的。毫无疑问,自从苏联文化部1971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改善图书馆学和目录科学研究的措施》后,等于在相关部门的协作中架设起一座桥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确立了此后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还建立了直属文化部的科研工作协调委员会。该机构涉及到文化部、国家科委、苏联科学院、全苏农科院、苏联高等专业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教育学科学院、苏联总工会中央理事会、国家共产主义出版社、教育部等12个部门,包括了300多个大型图书馆。这个协调委员会直属苏联文化部,由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文化部长捷米切夫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图书事业的协调,重点解决图书馆学、目录学及其他学科间的彼此合作问题。为了加强目录学研究的质量,该机构特别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科研课题。总之,协调委员会建立后,对于科研任务的合理布局和规划,对于认定牵头科研单位与明确其具体工作,对于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承担的任务,都具有重要意义。

3 面向中国目录学的现实思考

回顾俄国目录学20世纪走过的漫长道路,确有许多东西可作借鉴。笔者觉得有如下两个方面应当深入研究和实践。

3.1 新世纪应当进一步发挥书目的教育职能

在俄国目录学历史上,推荐书目仅仅是众多书目中的一种类型,但它的地位却不同寻常。且不说专门的推荐书目研究所从30年代已经应运而生,即使翻阅当代俄国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亦足以深受启发。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到,推荐书目与国家

书目并列,甚至以专章反映“苏联推荐书目的现状”。^[6]推荐书目的“特殊”是与它在社会上发挥的巨大教育职能分不开的。

俄国的优秀推荐书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以鲁巴金的《书林概述》为例,除了注意收录文献的系统性、完备性之外,还有重要一条:许多内容是聘请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批专家完成的。专家的参与是保证书目质量、提升书目层次的重要手段。我国以往最有影响的推荐书目也证明了这一点。1953 年北京图书馆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之所以影响深远,也与其中一些重要条目是由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的撰写有关。

要在新世纪编出优秀的推荐书目,不仅要向国外学习,还应当汲取本国的经验教训。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传统文献称得上无际的海洋。如果为一般读者编写这方面的书目而不作精选,一味地贪大、求全,就很可能达不到效果。当年北京图书馆编写《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总共选了 20 种名著,1923 年吴虞的《中国文学选读书目》也只收录历代名著 40 余种。当然,吴氏书目后来风靡学界,其影响甚至胜于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除了做到少而精外,加强书目的引导性(如将书目区分为“专精”与“涉猎”两个层次,对不同版本注释说明),也应该是重要原因。

3.2 新世纪理论建设贵在与时俱进

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实践。但包括俄国目录学在内的科学发展史表明,理论的建设贵在与时俱进。

目录学理论建设涉及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把握住学科发展的制高点;二是根据这个制高点,为本学科构筑科学的理论体系。客观地说,20 世纪的中国目录学界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成绩,但其中不无遗憾之处。无论是制高点的寻觅,还是理论框架的建筑,都不能说“及时”二字,都走了一段较长的弯路。

当然,构建理论体系之路要略微好些。中国传统目录学以往一直表现为读书治学的工具,单从学科建设而言,本来就无所谓严整的理论体系。但从 20 年代起,理论体系建设不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步伐也逐渐加快。首开先河的是姚名达先生。他在 1933 年完成的《目录学》中,第一次勾划出原理、历史、方法的初步框架。文革后的 1982 年,北大、武大两校合作出版了《目录学概论》。本书在形式上虽带有姚氏专著旧痕,但视角、内容焕然一新。仅仅过去

四年,彭斐章教授等人根据社会发展特点,又于 1986 年推出新作《目录学》,构建了理论、方法技术、组织管理的新型理论体系。

相比之下,为寻求学科制高点所走的道路要漫长、曲折得多。进入 20 世纪以后,事实上“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目录学的制高点早就难以支撑现代目录学的理论大厦了,然而新的制高点在哪里?经过多年的“求索”,甚至经过了 6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关于目录学对象、任务等有关问题的两场大辩论,依然没有“求索”到真正的“对象”。一直到了 80 年代中期,经彭斐章教授从前苏联引进“书目情报”这一全新概念并进行深入研究后,问题才算基本得到解决。笔者以为,透过此事足以引出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寻求学科制高点实属不易之事,但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至为关键的理论问题,又必须毫不含糊地解决它,所以目录学界很需要一批像彭斐章教授那样功底深厚的学者潜心研究;二是学术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学术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探讨,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势在必行,不仅要经常进行国内的学术交流,还要经常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以上事实表明,既然时代在前进,目录学理论便不会也不应该就此踏步。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 21 世纪,深入开展目录学理论研究的任务尤为繁重。因为“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理论建设,但不希望看到杂乱无章的理论体系;我们树立大目录学观,但不可能包罗万象”。^[7]紧跟时代步伐,及时融入新观念,占领关系全局的学科制高点,并据此构建更加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应该是新时代目录学工作者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55
- 2,4,5 巴尔苏克,卡尔叔诺夫著;王锦贵译.苏联目录学:现状、问题与前景.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3)(4)
- 3 彭斐章.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武汉大学学报,1983(4)
- 6 科尔叔诺夫主编;彭斐章译.目录学普通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 7 彭斐章.面向未来,重塑辉煌.见:图书馆学与资讯研究论集.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王锦贵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北京大学.邮编 100871.

(来稿时间:2002-02-27)